



不能因为创新的技法， 丢弃小说的基本常识和规律

□丁帆

要说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那就是艾·丽·伏尼契的长篇小说《牛虻》了，它在我的人生成长道路上，在我世界观的形成中，在我的价值观的定位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迹。为了重读这部长篇小说，我把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第1版的竖排版《牛虻》，和译林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的横排版进行对读，试图将其连缀成一篇个人阅读史的文字，以期反映出各个时代阅读语境不同，而造成的阅读效果的差异性。

围绕《牛虻》的主要线索是什么的问题，我是经历过几个认知阶段的：从一开始的爱情的单线主题，到“革命加恋爱”的双线结构，再到革命与宗教冲突中人性大搏斗的终极主题表达，让我将《牛虻》父与子的人性冲突，放在了这一个更高层次的哲学悖论问题上来进行深度的剖析，发现了这个小说真正的主线是牛虻与蒙泰尼里之间宗教和人性搏斗的阐释，两个主人公，一个成为革命的牺牲品，另一个成了宗教的殉葬品。人性中不仅仅爱情是崇高之美，灵与肉在这里升华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但是，人性中的亲情冲突往往也是小说的聚焦，所以，在最近阅读《牛虻》时，我才真正意识到小说的主要矛盾是围绕在父子之间展开的，这一条线索一直被爱情的纠葛叙述所冲淡和遮蔽，被牛虻艰苦卓绝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所湮没。事实上，小说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叙述和塑造，以及所要表达的终极思想都是围绕着信仰的冲突而起，而终结的、人性冲突的火花燃烧成了一片信仰危机的火海，那才是这部作品永远能够在不同时代延续下去的理由。而这一点恰恰是70年来被忽略和置换了的小说主线结构。

如果说“拯救与反叛”成为这部小说的主题内涵的话，那么，拯救他人和自我救赎就成为横亘在许多长篇小说叙事中无法解决的一道人类命运的难题。2023年，我读到两部试图完成拯救叙写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最后都让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一部是《星空与半棵树》，另一部是《欢迎来到人间》，两位作者都想在长篇小说中解决人类拯救的主题表达，但在主题的释放上、在面对残酷现实的勇气上都略有欠缺。《星空与半棵树》是一部悲情的批判现实主义力作，在血色的暗夜里，作者通过“天文望远镜”这个具有浪漫色彩的画笔，去展现远距离的一片灿烂星空，使其成为作品主旋律中的副旋律，那是作者试图给人类的一丝希望，虽然那是一个距离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梦想，但是，暗夜里的辉煌难道不是人类活下去的希望吗？这样的艺术处理在当下同类题材作品中已经算是非常到位了，却仍然令我感到一丝规避直面惨淡人生的遗憾。《欢迎来到人间》的终极目的就是想解决拯救他人的灵魂的难题，但是，又有多少读者把目光聚焦在这个关乎到人类共同命运的主题上来呢？主人公傅睿也好，护士小蔡也好，他们作为医护人员，只能拯救病人的肉体，却无法拯救他们的灵魂；这就使得傅睿这样的医治他人肉体痛苦的医生，陷入了无法完成的“拯救他人”和“灵魂自我救赎”的手术之中，这种在二难命题中不能自拔的宿命，使得小说的主旋律呈现出欲言又止的模糊状态。因此，呈模糊状态的主题表达的深度哲思就被许多读者忽略、浅解和淡化了。

而反观《牛虻》，在“拯救与自我救赎”主题的表达上十分明晰与深刻。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牛虻》真正的主题阐释应该是——一个从宗教蒙昧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在蒙受了谎言的欺骗后，毅然决然走出宗教迷狂的魔圈，在苦难的生活中，成为一名争取个性自由解放的资产阶级革命者，从而用革命的方式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最后完成了拯救他人和自我救赎的使命。从小说的结构上说，如果说“革命加



■ 我试图从《牛虻》的故事情节、人物描写和细节描写的角度，来警示当下小说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的危机

■ 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成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全取决于小说的细节描写。我们绝不可以因为创新的技法，而丢弃了小说的基本常识和规律

恋爱”的叙事是小说平铺直叙的“主歌”的话，那么，激动人心高潮呈现的“副歌”，则是牛虻与蒙泰尼里两人的“自我救赎”——牛虻年轻时从宗教中获得了自我解放，最后为救赎他人苦难和解放人类的革命，走上了鲜血淋漓的刑场；蒙泰尼里在他的儿子亚瑟死后，意识到自己就是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人性的感召让他幡然醒悟，在对宗教信仰的疑惑中崩溃死去，以肉体毁灭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

苏联文学理论家耶·叶戈洛娃说：“伏尼契写出来：在少年时代热烈地信仰上帝的牛虻，怎样根据自己亲身的经验，认识了宗教以及它那博爱的说教底真正价值。事实上，在那好听的言语后面，就存在着伪装、叛变和谎言。除了奥地利之外，教会就是牛虻主要的敌人。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原来只是一个神父、后来升做主教和红衣主教的蒙泰尼里。在表面上看来，他似乎是一个和善而又诚恳的人，老百姓盲目地信仰着他。但蒙泰尼里也是宪兵手中的工具，老是假装好人，而且说谎。读者可以看到，他凭借着那虚伪的对上帝的爱的名义，犯了极严重的违背良心的大罪，而且结果连他自己也变成了这一罪恶的牺牲品。”过去，我们就是顺着这一价值判断去理解蒙泰尼里这个人物的，但蒙泰尼里真的是这样的人吗？如果在这个人物身上看不见其人性悖反的双重人格，那就只是对这部作品的浅表性解读，忽略和扭曲了这部作品最深刻的哲理表达。

过去我们阅读《牛虻》，都是将蒙泰尼里作为敌人，因为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下，红衣大主教和那些神父就是以上帝的名义，作为封建皇帝的代言人。无疑，小说无情揭露了蒙泰尼里的虚伪性，比如他在牛虻关进监狱时几次看望，都是规劝牛虻皈依宗教，因为他不知道牛虻为什么会对他持有如此刻薄无情的仇恨，试图用爱的教义去感化牛虻：“列瓦雷士先生，直到现在，我还没有侮辱过你，对你的信仰，你的朋友没有说过一句轻蔑之词。可不可以请你也同样以礼相待我呢？还是要我有这样的看法：一个无神论者成不了上等人。”蒙泰尼里从小让亚瑟在图书馆里读书，并每日对他宣传教义，就是希望他的儿子也成为“一个唯心主义的‘上等人’”，他自以为用毕生的精力完成了通往“上等人”的天路历程，在铺满鲜花和红地毯



《牛虻》，艾·丽·伏尼契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7月



《牛虻》，埃·莉·伏尼契著，译林出版社，1995年6月

的道路上，多少匍匐在他脚下的信徒视他为神，他自认为自己在拯救劳苦大众，拯救这个充满着血腥的世界。

而那个早已打碎了神龛的牛虻，无时无刻地在各种场合中用最尖刻的言辞攻击其生父，这场战争正如牛虻引用《圣经》中耶稣对圣徒们所说的话那样：“你们不要我带着和平来到世上，我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剑。”但是，这个诺言在牛虻的革命行动中，在即将脱离险境的时候，一刹那就被人性的力量所摧毁了，当牛虻向敌人猛烈射击时，蒙泰尼里“为了和平”的突然出现，让这个革命意志坚强无比的战士，垂下了手中的火枪，被人性混灭的上校俘获。有谁知道，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在牛虻刻骨铭心的仇恨中，潜藏着的是对蒙泰尼里的巨大热爱呢？他放下了“杀老鼠”的火枪，奏响的却是人性的强音。

作为一部19世纪后期出版的长篇小说，伏尼契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属于老派的写法，比起当下中国经历过40多年长篇小说艺术方法技巧洗礼的成千上万作品来说，《牛虻》似乎已经成为“古董”了。当今小说的写法和读法已经进入“后现代”的文化语境之中，《牛虻》式的写法已然成为读图时代的奢侈品。在快节奏的生活里，慢阅读者几乎成为时代的“零余人”。然而，除了外在的因素，我们今天很多小说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已经销蚀了审美快感，那么，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吸引读者的基本元素，是否被这几十年来现代性所抛弃了呢？

我试图从《牛虻》的故事情节、人物描写和细节描写的角度，来警示当下小说创作方法和艺术技巧的危机。

当年，我是一口气读完《牛虻》这部小说的，虽然，我并不懂得小说所要诉说的什么样的价值观，但是，故事情节的复杂性和悬疑性，让我这个懵懂少年读者不忍释卷，那全都是因为《牛虻》的故事悬念，在牛虻与琼玛的爱情纠葛中若隐若现，在牛虻与蒙泰尼里的矛盾冲突中引而不发，读者被作者伏尼契的艺术手法吊足了胃口，牛虻和亚瑟、牛虻和蒙泰尼里身世和经历的谜底，始终在读者的猜测中得不到确证，就像琼玛所说的：“我会在每个人的脸上看到亚瑟的模样。这是一种幻觉，像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做的噩梦。刚才，那个讨厌的东西面对着我走过来的时候，我竟荒唐地把他当成了亚瑟。”亚瑟这

个幽灵般的人物和他消失后的故事，一而再、再而三地处于若隐若现的叙述过程中，直到进入小说高潮时才最后揭开谜底，这种故事结构技巧，虽然似乎有点老套，但是，正是这样的曲折复杂吸引了几代读者，同时，它也为人物塑造做出了合理合情的铺陈。

《牛虻》在人物塑造上与众不同，“圆形人物”，也即“典型性格”的精心刻画使它不同于一般长篇小说“扁平人物”描写的范式而避免了落入窠臼。正如小说中形容牛虻这个“幽灵”式的人物那样，从死神中“复活”过来的牛虻，其性格特征完全有别于他的过去，也有别于其他革命党人，是“这一个”双重性格“典型人物”——作者塑造出来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成为一个突破概念化、脸谱化的小说人物模式，让人物成为一个重新“复活”的大写的人，尤其是人物从贵族坠入底层苦难的平民的描写，增强了人物形象的伟岸和人物性格的厚度。

当然，不仅仅是牛虻人物性格的描写，即便是次要人物的描写也是十分精彩的。作品有两章描写那个与牛虻同居的吉普赛女郎绮达·莱尼，虽然着笔不多，但是，人物性格凸显，令人回味无穷。正是这个善于游走世界和各色人等的吉普赛舞女，在阅人无数中看破了世间红尘，她与牛虻的深谈充满着人生的哲理，表现出一个风尘女子的生活睿智，只有她才能一针见血地说出令牛虻也感到震惊的深刻之见：“你关心的不是主教。”“是仇不是仇，反正你爱他胜过爱世上任何其他的人。”虽然，绮达最后离牛虻远去了，但是她的身影永远定格在《牛虻》的人物形象的高处，为这部悲剧小说增添了绚丽的色彩。许多年后，当我看到风靡一时的电影《叶塞尼亚》时，我暗自将这个充满着个性的吉普赛女郎与《牛虻》中的绮达相比，其悲剧性的人物刻画，显然逊色于后者。

毋庸置疑，长篇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成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全取决于小说的细节描写。所以，细节描写就成为小说构成最重要的元素，缺少细节描写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难以被读者接受的，多少年后，读者能够记住的往往就是小说中那些动人的细节描写。比如，《牛虻》中几次出现的“白色花瓣”的描写，成了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中不可或缺的“具象”，同时也成为了小说浪漫悲剧的诗性“意象”：“他从花瓶里摘下一朵菊花，慢腾腾地撕下一片又一片的白色花瓣。琼玛于无意中看到他瘦骨嶙峋的右手，见那手一片一片地撕着花瓣的姿势，心里觉得好不自在，因为她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姿势。”后来，“牛虻从钮孔里的花朵上摘下一片花瓣，慢慢地撕成碎片。琼玛觉得很奇怪，他那种动作很像是另一个人，是谁呢？”再后来，屡屡出现的“衣扣孔上别着的鲜花”成为牛虻衣着细节的标识性饰物，大大提升了小说故事性的悬疑效果。

《牛虻》中最让我感动的细节描写还有很多，最难忘的就是牛虻抱起街头满身鲜血的六岁儿童时的细节描写：“他掏出小刀，敏捷地把划破的衣袖割开，让孩子的头贴在自己的胸口”，面对一个受伤而饥寒交迫的流浪儿童，连侍者也一脸茫然：“这样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怀里竟然抱着一个破破烂烂的流浪叫花子。”每次我看到这里，就不禁潸然泪下，是细节的力量征服和震撼了我的心灵。除了这些，这部小说中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也是十分精准的，其修辞手法也是非常值得赞叹的，大量《圣经》故事中的典故被引用“借喻”和“隐喻”过来，形成的反讽修辞手法，让读者从中获得语言幽默、诙谐和揶揄的狂欢。为此，我从中得到启迪：我们绝不可以因为创新的技法，而丢弃了小说的基本常识和规律。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 评论

文学会议对文学发展与文学体制建构的影响

——评斯炎伟专著《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

□郝龙敏

作为一种“日常化”的存在，中国当代文学会议不仅数量巨大，而且形态庞杂，要对它作出实质性的学术探讨其实并非易事。如何搭建一套兼具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证、思想与史料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框架，对当代文学会议作出全局性与系统化的专门研究，是重要的当代文学研究议题。

斯炎伟的新著《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整体阐释了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身份特质、历史衍变、内部要素以及功能价值等，而且以一种“知识考古”的方式，对若干重要文学会议的学术内涵作了深入考察。该著的“上编”为学界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知识谱系。它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角度指明当代文学会议存在与运作的逻辑根基，梳理当代文学会议生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对当代文学会议作类型化的分析与内部构成要素的解读，考察文学会议对当代文学的规划、践行以及文学秩序建构所具有的独特影响。“上编”很好回答了中国当代文学会议“是什么”以及“如何影响文学的生成”这两个问题。“下编”则聚焦于不同类型和历史节点的文学会议的个案考察。综合运用史料钩沉与理论阐释，不仅对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大连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的学术价值作了深入开掘，同时也通过对会议个案的分析，充实并印证了当代文学会议的理论表述。总之，该著以多维立体的研究路径，呈现了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内部肌理与外部价值，提升了当代文学会议研究的格局。

其次，该著有不少论述让人读来眼睛一亮，颇感新颖。《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中的很多章节是前后穿插、彼此观照的。作者并不孤立地谈论会议本身，而是将会议的缘起、筹备、召开、反响等作系统性考察，把读者带入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感受一个个鲜活、有温

度的、非概念化的文学会议。比如对第四次文代会的论述，斯炎伟并没有习惯性地第四次文代会的开幕当作开场，而是另辟蹊径，从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的准备工作切入，在上溯与下究的视角中，形成严谨的论述逻辑与行文结构，由此呈现第四次文代会发起、筹备与召开的详尽过程，以及文艺界围绕此次会议的召开所产生的种种波动。除此之外，此书也从微观入手，将文学会议中“人的活动”一定程度地表现出来。“大连会议”上与会者的诸多“牢骚”，第四次文代会代表产生过程中的纷争等，不仅带给读者强烈的现场感，同时也体现出斯炎伟历史研究中那份可贵的“理解”与“同情”，始终以一种学理的眼光和“历史关怀”的胸襟去看研究对象本身的复杂。

再次，该著占有史料丰富，且阐释得体合理。斯炎伟为撰写该著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其中包含了一些过去未披露的材料，或以往学者们鲜有使用过的一手材料，通过对这些文献资料的爬梳、对读与辨析，得出自己的见解。斯炎伟不仅查阅了大量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传记、文集、回忆录等，而且在处理这些资料时秉持客观与学术的立场，既发掘材料中的“基本历史事实”，又努力甄别材料背后所掺杂的“有偏向”的叙述与个人情感，多声部呈现各方意见。知人论世，实事求是，不故作惊人之语，也不夸大或遮蔽某种声音，在给人以可靠感的同时，使论述始终保持着鲜明的问题导向与学术含量。

显然，《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研究》凝聚着作者的学术理想，尽管在文学会议对未来文学发展以及中国特色文学体制建构的影响等方面尚值得进一步探讨，但无论在学术场域方面，还是在研究范式上，该著对中国当代文学会议的研究都具有鲜明的开拓性意义。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

■ 第一感受

邵丽《是真佛只说家常》

悠悠世事见真淳

□梁静雯

“空气清新而冷冽，也许是久等生幻，仿佛回到孩童，是除夕的早晨，那种欢喜如同新生。”这是邵丽笔下法兰克福的空气。读至此处，一种干净而清朗的喜悦不禁从胸腔升起。很难想象，一个连空气都能具象于笔端的作家究竟有多么热爱生活。在《是真佛只说家常》这本散文集中，字句间皆是悠悠世事的温情与欢喜，那些回忆与现实交杂出的生活韵味，面对每一处日常风景的认真，无不传达着作家热气腾腾的真与淳。

《是真佛只说家常》收录了邵丽的38篇散文。该书分为“读心”“遇见”“读人”“美食”四辑，从物、景、人等多个角度展现了作家对生活的敏锐感知。

这种敏锐首先来自于作家对“物”的捕捉。“越来越沉迷于一些真实的物质。为了给一块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石头或木头拴一根绳，我学着打各种结，配上跑遍全国甚至从国外收集来的各种小配饰……我变成了一个没目的的手工匠人。事实上，我越来越渴望成为一个这样的人。”《物质》作为这本散文的首篇为整本书铺染了一层兴致勃勃的烟火气，生活中的一物一件、一草一木在作者笔下都关乎着一种不可轻视的认真。宵夜时的一碗鲜汤，细心护理的衣着，长途跋涉也要带回家的桌布……越是细小之处的流连就越足动人至深。生活中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物件恰恰是作者用心经营之处，而唯有对生活足够纯粹热爱才能使人如此全情地投入于“物”中。而这些对“物”的关切也不止于物，它更连接着过往那些被清贫反复洗濯过的自尊自爱，也连接着此刻“只有吃货靠神祇最近”的笃定与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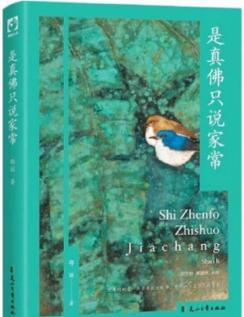
除了对“物”的捕捉，这本散文中还有着对“景”的体察。比如《在远方》一文记述了作者在德国参加书展时的见闻。从法兰克福到波茨坦，从沿途的小镇到西西里宫，跟随作者的

脚步我们仿佛也漫步于树木林立的街道，走过了那些恢宏古朴的建筑。作者对“景”体察是多重的，她既描绘一时一处的风物，也有着对文化和历史的回望。在邵丽的笔下，文化既是天堂一般的泊车位，也是坐在葡萄架下读小说的农民，它们美好得像童话中的风景，显示着一个国家浸透了秩序与礼仪的风度。而德国复杂的历史则同那些参天古木一道，扎根于城市的前世和今生，正如她在文中所说：“一个总是坐在历史前排的国度，步步都是历史，而参天的树木好像是它的见证人。”在这本书中，作者总是能将个人对“景”的感受置于更广大的文化背景之中，在赞叹欣赏之余不由得也带出了历史变迁的厚重之感与反观自省的真诚思辨。

而在整本散文中，最深刻的便是作者对“人”的关照。在《宛如清汤》《有匪君子》《小友记》等几篇中，作者细致了她对文坛好友的印象：清醒坚定的魏微、有着古典美的付秀莹、持重诚恳的徐则臣、向世界热忱抒情的张楚……这些为大众熟知的文学名家在邵丽笔下变得更为生动可爱，而作者对这些好友的作品也是如数家珍。透过这些娓娓道来的絮语，我们仿佛能看到一道长长的目光，它饱含着欣喜与真诚，爱护和关切，长久地注视着这些文坛力量的成长。而作家对“人”的关切不止于此，在阅读中，邵丽展现了更为广阔的思考和共情：“深深地沉浸到他们的生活里，你会突然不再鄙视书中的任何人，大家各自为生计周旋，设身处地，也着实让人心疼。”作者与角色共悲欢的立场、对故事反复的思索，无不体现着满腔的真情，而这对虚构世界的体谅应是一位作家对“人”最深切的关照。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的诗拿来形容邵丽的散文一样合适。仔细咀嚼书中富有想象力的真切表达，跟随作者在悠悠世事中观物、赏景、读人，那些掩藏于日常中甚至至淳的触动便会对你轻轻耳语：是真佛，只说家常。

(作者系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



《是真佛只说家常》，邵丽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23年7月